

XIN JI DIAO

新基调杂文创作谈

za wen chuang zuo TAN

长征出版社



刘 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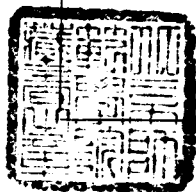
长征出版社

新基調
杂文
创作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6835



1056835

封面设计 廖宗怡

扉页题字 陶 白

新 基 调 杂 文 创 作 谈

刘 甲 著

*

长 征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二二三〇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5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9268·007 定价：1.20元

目 录

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	(1)
漫谈杂文研究·····	(23)
澄清对杂文的一些偏见·····	(29)
鲁迅和“鲁迅式杂文”·····	(35)
鲁迅式杂文的战斗传统·····	(41)
“杂文时代”和“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	(50)
新基调的杂文的特征·····	(56)
新基调的杂文的理论基石·····	(58)
“隐晦曲折”和“大声疾呼”·····	(68)
讽刺的种类及应用·····	(75)
杂文的“全面”和“分析”·····	(81)
建国后新基调的杂文的兴起·····	(87)
新基调的杂文的基调·····	(93)
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	(99)
坚持官民一致的原则·····	(103)
杂文与民主·····	(108)
从匕首、投枪到良药、解剖刀·····	(114)
新基调的杂文的两个问题·····	(119)

关于歌颂性杂文	(125)
关于“匡正时弊”	(131)
“说长道短”辨	(137)
摆在面前的两个问题	(143)
杂文同评论的区别何在?	(148)
“鲁迅笔法”的学习和运用	(153)
也谈“杂文味”	(166)
关于建国后的杂文创作发展过程	
——致某刊编辑部	(169)
关于1957年——1958年杂文创作的评价	
致某刊编辑部	(173)
就杂文写作致作者之一	(175)
就杂文写作致作者之二	(177)
《纵横集》后记	(179)
《不惑集》序	(183)
《灵魂的感光》——杂文集自序	(188)
聊以充序之序	(192)
杂文的演变与现状 (节录)	(196)

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

新基调的杂文

这篇书序，取了这样一个大题目，并不是为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而是毫不掩饰地直言道出我的目的。

把当代杂文称作“新基调的杂文”，是通过同鲁迅式杂文作比较相区别而言的。

那么，什么是鲁迅式杂文？什么是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两者间的继承如何？它们之间的基本区别何在？各自又有哪些可以相比的不同特点？这些如何在杂文创作中去把握和运用？这一切，正是这个集子着重探讨的问题。

现在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来加以探讨，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是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的需要。

杂文总是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向前发展的。鲁迅和他同时代的鲁迅式杂文的作家们，曾经随着“五四运动”

“来了一个展开”，一道创造了无愧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鲁迅式杂文。同古代杂文相较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仅仅抒发个人性灵、情趣、愤懑的小品，而成了战斗的“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在“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理应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来，而且理应又比鲁迅式杂文更为光彩夺目。作为我的愿望，那就是能够看到当代的杂文工作者们一道努力创造出这种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来。如同鲁迅和鲁迅式杂文作家们一道曾经创造了无愧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鲁迅式杂文一样。

这样一种设想和愿望，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和根据呢？我以为是有。根据之一是，在我们的时代，杂文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日益发展，较之以前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即以当前的情势而论，哪一个生活领域不在急需杂文去加以干预？根据之二是，尽管尚存有种种某些不利于杂文发展的因素，诸如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尚不够完善、健全，民主风气发扬尚不普遍，有些地方言路尚不够通畅，有些人特别是有些握有不大不小的权力的人，还不能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杂文的批评，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较之反动统治的时代，毕竟已是根本不同了。处于国家主人翁地位的杂文作者在创作中所遇到的艰难，同处于奴隶地位的杂文作者在创作中所遇到的艰难，毕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特别是进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新时期，杂文创作已处于空前未有过的大好时机，也必然会逐渐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坦途来的。根据之三是，几十年来杂文创作发展的实绩，证明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已然形成。建国三十多年来的杂文创作发

展史，可以说就是由鲁迅式杂文过渡转化为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的历史。尽管由于它几遭风雨，至今仍是花不够艳，果不够丰，一般并还缺乏鲁迅式杂文那样的光采。但较之鲁迅式杂文，它毕竟已经具有了新的基调，且在广泛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匡正时弊，对新生事物的支持赞助等方面，已经较鲁迅式杂文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无论从时代提出的要求来说，还是从时代已经具备的条件来说，都理应有比鲁迅式杂文更为光采夺目的杂文产生；无论从理论方面看，还是从创作实况看，只要努力，必将会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来的。

然而，目前却还远远未能达到“无愧”的这种地步。那么原因何在？出路何在？这正是需要提出来探其究竟，并为之大声疾呼的问题。

第二，是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发展方向，推进当前的创作和研究，避免重大曲折的需要。

自鲁迅逝世以后，围绕着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杂文的问题，四十多年中发生过多次争论，目前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影响着杂文创作的繁荣。对此需要结合实际加以探讨和总结，以便统一认识，明确方向。这种争论，据我所知先后进行过六次。除了一次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国民党统治区挑起的以外，其余五次都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争论，除了最早的一次是发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孤岛”以外，其余四次都是在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进行的。各次争论都是围绕着是否“还是杂文时代”，是否应该仍然发展鲁迅式杂文的问题来进行的。对这些争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可以使人明瞭，在何等历史条件下，必定

会产生鲁迅式杂文，而在另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必定会发展另一种新的基调的杂文了。

建国三十多年来，新基调的杂文创作经历了四起三落的重大曲折，也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造成这种曲折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工作路线发生过重大的偏差和失误，因而便同坚持“匡正时弊”的杂文创作，发生了暂时的难于调和的矛盾。而历次过火的政治运动，又总是对杂文的杀伐过重，对杂文作者的打击和伤害过大。但另一方面，杂文创作本身尚存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发展方向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明确认识，也是一个原因。一般情况下，前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决定性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后一个方面也会成为主要的原因。现在前一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了解决，尚存的问题，已有可能逐步加以克服和解决了。后一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逐步加以较为彻底的解决了。解决的基本方法，只能是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充分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探讨，以求获得一致的认识。

第三，是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壮大杂文工作者队伍的需要。

只有造就必需的人才，形成一批中坚分子作骨干加以支撑，我们时代的杂文创作才能真正繁荣，才能保持长盛不衰，也才能因此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来。

这样的中坚分子，依我看需要具有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对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的特点，对其创作规律和发展方向，具有明确的认识。如果只懂得一般杂文的特点及其创作规律，那是不够的；就是懂得了鲁迅式

杂文的特点及其创作规律，也还不够；而是必须还要懂得一点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的特点及其创作规律才行。这就需要通过对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作深入的探讨来提高人们的认识。

第二个条件是，要具有把杂文创作当作一番事业来干的决心、信心和一定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当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杂文尚不够理解、正视，甚而存有种种偏见和歧视的时候，在杂文的气运不佳的时候，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他们要能知难而进，而不是遇难辄退，他们要有坚持不懈的韧性，而不是脆而不坚，或只有短暂的冲动和热情；他们对新时代的杂文抱有热烈的期望和追求，而不是兴之所至偶而为之，也不是有利则作无利则休。由于三十多年来杂文气运不济，给了不少人以错觉，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尚未能下定决心来一显身手。要克服种种余悸，坚定信心和决心，也需通过这种探讨来消除错觉和偏见。

第三个条件是，要具有一定的功力。无论从事杂文的创作、编辑、研究教学那一项工作，都需要各自具备一定的功力。要能写得出、鉴别明、讲得清，才能有力量开拓前进。这个方面，固然需要有深积厚累、勤磨苦练，决非朝夕之功可成，但只要有了信心和决心，造就起来并不难。这也要首先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方向明，决心大，才会出硬功。这无疑也需要对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加以深入的探讨。

我每常私心付度，在全国尚能造就出一批兼具以上三种条件的人，分别从事创作、编辑、研究教学，通过他们再团聚起一大批人来，并从中不断再产生出新的中坚分子，如此代代相继，那就能使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创作长盛不衰，

也就能赖以实现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来的愿望。为此，就需要我们抓紧来作一些艰苦、扎实的研究探讨工作，以期有成。这也正是我不避浅陋，要把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讲出来的原因。

我以为，要把这个问题说得较为清楚一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新基调的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基本区别何在？它不同于鲁迅式杂文的特点和在创作上应该注意把握的原则是些什么？

第二，新基调的杂文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什么？主要是深入地探究毛泽东为新基调的杂文所奠定的理论基石的坚实性和可靠性，并结合探究围绕着时代性质与杂文发展方向所进行的历次争论，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和教训来。

第三，新基调的杂文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着重探讨新基调的杂文对鲁迅式杂文有哪些继承，哪些发展和哪些不足？总结当代杂文创作中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第四，新基调的杂文在创作方法、写作技巧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着重探讨杂文与一般报刊短论的区别，如何加强杂文味，对“鲁迅笔法”的学习运用上有哪些发展和不足？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正是试着按以上四个方面加以编纂的。只是疏漏尚多，不仅需要读者指正补缀，也还需期之以来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

二

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这个称谓，虽是在1984年11月才

正式提出来，但对于这个概念的酝酿、孕育，却由来已久。而且，这也并非由我独创，而是受了众多的影响、启发、推动，杂糅众说才逐渐形成的。

应该说，最早为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关于杂文的观点，是对当时关于杂文发展方向问题争论的总结。这些连同他后来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关于杂文的观点，可说已经论及了有关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要求，虽然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这样的字句。

我在集子里的这些看法，正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这些基石之上的。这自然并不是说，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对于毛泽东这些观点的片面理解，也不是说这种片面的理解没有对杂文创作和报刊编辑工作产生过不利影响。这些都是发生过的，我自己就曾有过某种片面的理解，且对自己的杂文写作和编辑工作产生过影响。但是，这些同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完全是两回事。应该加以区分，并分别进行检验。

在此我愿说一说我的观点形成的脉络和过程。

四十年代，我对于毛泽东同志关于杂文的观点尚无所闻，当然也就谈不到受其直接的影响了。但间接的影响还是有的：一是通过我的一位老师，一是通过谢觉哉同志的杂文。

抗战前我读小学时，读到过鲁迅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鲁迅的一些杂文。比较起来，除了《阿Q正传》以外，我更

爱那些尖锐（有时其实是爱其尖刻）泼辣、议论风生而又言谈随便的杂文。

1942年我随军到达陕甘宁边区，转入绥德师范就读，课外仍然主要是读鲁迅的杂文。一次于作文中，仿鲁迅刺“正人君子”的笔法，对一位我很看不惯的老师作了一番讥刺。语文老师（他是从延安派来的）批语说：文章笔底是清楚了，但对自己的老师又是同志的批评，不应取这样的态度。我很感新鲜地接受了这种观点，但并不知道他是转述的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这可说是我最早受到的讽刺应该区别不同的对象，不应该乱用的观点的影响。后来又从延安《解放日报》上读到了焕南的杂文。依然是那样尖锐泼辣，议论风生而又很随便的文章，惹人爱读。但那情感、气氛、态度，在我的感受中，觉得同鲁迅的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切合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感受和生活气氛。但于当时，却并没象现在这样理解到这是由于基调的不同的缘故。

1945年，我在陕甘宁边区甘泉县完全小学工作。根据自己的感受，写了一篇题为《请假》的短文，寄给延安《解放日报》。当时我只是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看到的群众的疾苦，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病，以及自己的想法，如实的反映给党报，而并没有想到要写什么杂文。但编辑却把它作为一篇杂感，发表在副刊上，还加了一个《一位乡村教师的感想》的副题。回顾起来，这恐怕要算是我所写的第一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基调的杂文了。

1947年8月，甘泉县的党政机关和游击队，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于战争中失利。国民党伪甘泉县长张雅轩因之趾高气扬，派人送来了“招降书”，企图乘势分化我

们残留的队伍，把本地一些党员干部拉过去，来对付我们少数几个外来干部。同志们读后，同仇敌忾，要我代为起草了一封《驳张雅轩书》，揭穿了他的阴谋，指出了他们正在面临着必将败亡的命运，勾划了他们那副囿于小胜，不知死之将至，还要洋洋得意自欺欺人的嘴脸。同志们传阅时大为痛快解气，纷纷签名。随后交给下书人带了回去。之后不到一年，延安和甘泉就先后光复。张雅轩也随之成了丧家之犬。从广义上来说，这篇未曾刊印过的文稿，可以算作我写的第一篇对敌斗争的新基调的杂文。

提起这些往事，并非觉得这两篇文稿有什么值得称道，而是觉得可以用来说明这样的问题：一个自觉到自己是受压迫的奴隶的人，写出杂文来，必然会具有清醒的奴隶反抗的基调。这是因为，作者通过他觉醒了了的奴隶的眼睛，观察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统治下的时代和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又通过了他的觉醒了了的奴隶的手，用笔揭示了那时代和那社会。他的揭示一面是为着对压迫者进行反抗，一面也是为着唤醒尚未觉醒的奴隶，来共同奋力打破枷锁，求得解放。这就是鲁迅式杂文。而一个自觉到自己已成了当权者的人，写出来的杂文，自然就会具有鲜明的新社会主人的基调。这是因为，作者通过他明亮的社会主人的眼睛，观察了他所生活的这个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过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和这个对旧的社会进行了一定改造的新社会，又通过他觉悟了的新社会主人翁的手，用笔揭示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他的揭示，一面是为着履行他“匡正时弊”的主人翁责任，一面也是为着提高那些尚未意识到这种主人翁责任的人的觉悟，来共同建立美好的生

活。这就是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不管作者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之中，也不管他们的作品是精还是粗，都会是如此的。两者的基本区别也仅在于此，而并非其它。自然，这也是后来才明白了的道理，当时是并没有想到写杂文上去。

1949年春，我被调入报社从事专业的新闻工作，但在1956年7月之前，却与杂文是绝缘的。既无所作，也不曾想到过要作，因为那时的兴趣是专心致力于新闻报道和特写。1954年倒是对于兴起一时的苏式讽刺小品文产生过一点兴趣，大概是由于这种小品文往往取材于真人真事，需要经过采访的原因吧。于8月间试作过一篇《热烈的废话》。对于一位从部队上转业到建设岗位上来作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的不切实际、夸夸其谈、不学习新事物、爱说老一套空话的作风，作了辛辣的讽刺。这一篇，虽曾屡屡被人指作我是“漏网右派”、“对党的领导不满”的罪证，但我却自以为，这是对于“对自己人的讽刺”的正确运用。因为于讽刺挖苦之中，存有热情和厚道，还有一点爱惜和切谏之心。我自觉到这也触及了自己，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同样的病痛。我所抱憾的是我轻率地提名道姓，不仅小有失敬之处，也多少造成了他的难堪。如果隐去姓名化作类型将更为好些。这个同志虽有如此缺点，但却是一位值得令人敬佩的心胸宽阔的好同志。事隔半年，我们又一次因工作关系于旧地重会，我曾向他当面致以歉意，他却毫无芥蒂，反而说那次的批评，于他确有良效。并对我们的工作，从东道主方面给予了关心备至的支持，于此使我感受到了真正共产党人对于批评的真正磊落的态度，这也是我始终认为在我们一些受过锻炼的老同志中，大有不乏勇于正确对待批评的人的原因之一。这位同志现

已故去，顺笔提起此事，除了谈谈我对于杂文的“讽刺”应分内外的感受之外，也是为了藉此向他补致我深切的悼念。

1956年8月，我奉命到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副刊作杂文编辑的工作。这时，也只是从这时起，我才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着重对他的关于杂文的观点进行了思考。然而那理解仍是肤浅的，有的还作了片面的理解；这是后来也才认识到的。

1957年4月间，《人民日报》副刊上开展了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的讨论。此事集子中已有专篇谈到，这里不作赘述。我当时只是略有所感：《人民日报》的杂文似乎与当年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杂文有些不同，但不同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并不了然。我对回春提出的“杂文是不民主的产物”这样一个论断，也无法完全接受；倘真如是，那末民主发扬得充分以后，是否就不会再产生杂文了呢？对此，当时也尚难以自答。当时的讨论，我未公开发表什么意见，实在是由于有些意思尚说不出所以然来。现在写在集子里的这些，已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思考，自以为是想得稍稍明白些了，这才写出来的。

1957年的夏季形势突变。一位负责管理报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严厉批评“大鸣大放”时期的副刊杂文“基调不对”，要求副刊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我们时代的杂文》这样一个题目，建议于总结之后，能够写出一篇如何看待新时代的杂文的文章来。这是第一次听人提到杂文的“基调”，提出的环境和方式又是这样的，其震动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基调”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当时并未理解，只是把“基调”二字深深印入了脑中，不时地进行着反复的

思考。接着便是杂文创作之潮的低落，当另一次杂文创作的高潮兴起来时，杂文已完全过渡转化为新基调的杂文了。把两个时期的不同杂文作过比较之后，这才对“基调”仿佛若有所悟。于是拾起了《我们时代的杂文》这个题目，为文发表在《新闻战线》1958年第八期上。文中虽已涉及到了“基调”的实质，但并没有如现在想得和说得这样清楚。现把这篇题目改作《新基调的杂文的两个问题》，也收入在集中。读者比较着读，是可以看出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发展脉络来的。

接着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杂文创作之潮又一次低落。我也因处理某篇杂文失误，以思想“右倾”需要劳动锻炼之名，被下放农村三年。此时便无暇顾及杂文如何了。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病返北京，断断续续重操旧业。这时的杂文创作，于困难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又一度兴起。十年动乱一来，否定施之于一切，新基调的杂文遭禁，“帮”文行时，只有盖头盖脸的批判，不容对杂文再作什么思考了。

对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作进一步的思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粉碎了“四人帮”，杂文又一次兴起。复兴之初，鲁迅式杂文曾一度再现。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思想禁区开始打破，杂文创作更趋活跃。当时曾误以为这是建国以来杂文创作经过长期的压抑之后，终于重获解放而复归于杂文创作的正途了。从此杂文可以象鲁迅式杂文那样任意而作了。于是有人兴奋地呼吁：“还是杂文时代，还要更多的鲁迅式杂文。”然而不久，《人民日报》副刊的杂文就又受到了来自领导方面的批评，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战线上